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 ——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高秀昌

(河南省社科院 哲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冯友兰是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哲学,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冯友兰;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哲学史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02)03-0112-03

冯友兰是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哲学,一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来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贡献。“三史”即《中国哲学史》(1931—1934 年)、《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1991 年)。“六书”即《新理学》(1939 年)、《新事论》(1940 年)、《新事训》(1940 年)、《新原人》(1943 年)、《新原道》(1945 年)和《新知言》(1946 年)。它们是冯友兰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和哲学史的创立和发展所贡献出的鸿篇巨制。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是有区别的。依冯友兰的观点,哲学家的工作是进行创作,而哲学史家的工作则是对于历代哲人所从事哲学创造活动的记述;亦可说,前者的重点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想的,而后者重点则是要说明以前的哲人对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套一句古人的话说,哲学家的工作是“六经注我”,而哲学史家的工作则是“我注六经”;套用冯友兰的话说,哲学家是“接着讲”,而哲学史家则是“照着讲”。事实上,虽有此种区分,但常有人兼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哲学家、哲学史家所写的哲学史分别称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哲学史家的哲学史。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哲学家只有以他自身的哲学作为整个哲学发展史的归宗即最高阶

段,才可以称他的哲学史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哲学史家只能做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如果以此来看冯友兰的“三史”,那么 30 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哲学史家的哲学史,40 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则是哲学家的哲学史,而 80 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哲学家兼哲学史家的哲学史。

一般都认为,胡适于 1919 年出版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开山之作,而冯友兰于 30 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继胡适之后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这两部哲学史著作的共同点是都采用近代的学术观念和方法,来研究和诠释中国哲学史;不同的是,前者偏重于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而后者则侧重于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为什么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这是因为此时的冯友兰还不是哲学家。不过他虽然不是哲学家,但可以称得上哲学史家。冯友兰于 20 年代后期所做的主要是讲授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撰写中国哲学史的三位一体的工作。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冯友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史家之“见”,而他的哲学史家之见解,主要体现在该书的“绪论”中。冯友兰站在世界哲学史的立场上,具“了解之同情”,备“史学之通识”,通过比较中西哲学,阐明了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内容、任务、方法及取材标准,分析了本来的

收稿日期:2001-12-08

作者简介:高秀昌(1964-),男,河南郑州人,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南开大学哲学博士。

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的关系,说明了该书兼用叙述式的哲学史与选录式的哲学史的缘故。正是在这种哲学史家之“见”(即哲学史观)的指导下,冯友兰成就了被后人称为具有中国哲学史典范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他自己也被赞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哲学史家资格的第一人。

诚如张荫麟在评该书上册时所说,“哲学史”有两重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系统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的起源,成立的年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1](P238)}概括地讲,哲学史要考察历史上各家哲学思想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如实地呈现各哲学思想的本来面貌,客观地描述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或脉络。事实上,冯友兰的“哲学史”就是这样做的。冯友兰为写一部较完善的好的中国哲学史,把以往写哲学史的两种方式即叙述式与选录式兼而用之,试图融合叙述式哲学史的系统性与选录式哲学史的直接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许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但是他以自己的哲学史家之“见”欲写一部较完善的中国哲学史的良好用心却跃然纸上。其实,这种写哲学史的方法在今天还是值得学人考虑的。

从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也可以看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西方哲学家多将西方哲学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时期。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比照西方哲学史的分期,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个时期。冯友兰则依据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征,根据哲学在不同时期应具有“特色精神”、“特殊面貌”,认为中国哲学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只有子学时代(即上古时期)和经学时代(即中古时期),而近代哲学尚在萌芽、创建中。既然没有新哲学产生,特别是此时的冯友兰也没有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他的哲学史只能讲到经学时代的终结。这恰恰是哲学史家讲哲学史的特征。而哲学家讲哲学史总是要以自己的哲学为归宗。

二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于1946年9月至1947年暑假,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做客座教授时,用英文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英文书名是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即《中国哲学小史》。这一部旨在为西方人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

提供“引导”、通俗而“形神自足”的小史,在海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冯友兰在写《中国哲学简史》时,已是创立了“新理学”体系的大哲学家。就在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他就不甘于做哲学史家了,而要立志做哲学家,创立新的哲学体系。经过10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他终于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体系。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已发现原来的《中国哲学史》有重写的必要。冯友兰于1944年《中国哲学史》重印“自序”中说:“此第一篇出版于民国十九年,全书出版于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已十余年矣。此十年中,吾之思想有甚大改变。假使我今日重写《中国哲学史》必与此书不相同。”^[2]冯友兰这里所说的“不同”,大概就是指作为哲学家的“中国哲学史”与作为哲学史家的“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所幸的是,此后的两个机缘促成冯友兰撰写两部《中国哲学史》,一是出版于1945年的《新原道》,副题是“中国哲学之精神”,另外就是上边提到的《中国哲学简史》。

作为“贞元六书”之一的《新原道》是“新理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因史成论,以说明“新理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因此,可以说该书是一部讲“新理学”、讲中国哲学的书。而作为当时应邀而写的旨在向国外宣传中国哲学(史)的书,它又由论入史,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作为线索,说明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趋势。因此又可以说它是一部叙述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书。所以,从总体上看,《新原道》是哲学著作兼哲学史著作,在“新理学”系统内实现了“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完美统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原道》就是一部哲学家的哲学史。

《中国哲学简史》不是《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的简单拼凑或叠加,而是冯友兰融贯自己以往思想而撰写的一部成熟的、简明的《中国哲学史》

《简史》以《新原人》的人生境界说为哲学基础,以《新原道》提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中国哲学(史)的问题与精神,以儒道释为主体,叙述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至全书最后一章,以“新理学”作为“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的例证: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在现代的新开展,一方面论述中国哲学对于未来世界哲学的贡献。冯友兰自信:“新理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哲学对未来的世界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由上可以看出,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所写的《中国哲学简史》,从其内容上看,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新理学”在历史上萌芽、生长和成熟的历史。因此,可

以说该书是一部哲学家的哲学史。

三

1949年10月,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以科学的历史观点”,将他在20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31](P637)}自此开始,冯友兰耗费了40年心血,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完成了7卷共160多万言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实现了他后半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夙愿。

冯友兰的《新编》与其以往所写的哲学史的最明显的不同是:这是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写的最完整的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冯友兰从他的“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的哲学观出发,希望把《新编》写成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跟以往的哲学史相比,《新编》将哲学史泛化了。不过,冯友兰并未陷入“泛化”中,而是始终以一般与特殊(即共相与殊相)这一根本的哲学问题作为整个哲学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着重阐发中国哲学中的人学内容及其精神境界。这表明《新编》的深层哲学基础是冯友兰于40年代创立的“新理学”体系。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冯友兰在其最后10年内撰写《新编》的过程中,思想不断解放,态度和观点也不断变化,从而使《新编》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诚如牟钟鉴在《冯友兰晚年的自我反省与突破》中指出的:“《新编》七册的写作,恰当中国现代社会变化最急速的十年,受时代气息的感染,写作的方法、角度、观点不断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至三册,框架相对陈旧,局部多有可取;第二阶段是四至五册,新旧参见,创见迭出;第三阶段是六至七册,大胆突破,惊世骇俗。”^{[41](P578)}冯友兰的话语由半开半放到完全开放,愈来愈能言为心声,在“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心境中,常发出惊世骇俗的“非常可怪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冯友兰关于《新编》第七册与前六册的关系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他把整个中国哲学史比做一条龙,“《新编》就是要画这条龙。前六册是‘东鳞西爪’,第七册是‘画龙点睛’”。前六册所讲的一切线索“都要在这里归宗。”^{[51](P455)}这里所说的归宗,不仅是指中国哲学“史”的归宗,中国哲学的归宗,同时也是指冯友兰“新理学”的归宗。《新编》的

前五册讲古代哲学;第六册讲近代思潮,第七册第七十一至第七十七章讲现代思潮,所讲的主要都是该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第七十八章至第八十章讲现代新哲学,即由金岳霖与冯友兰共同创立的(新)理学,和由梁漱溟(在第七十四章讲)与熊十力所创立的(新)心学;第八十一章讲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未来世界哲学的贡献。冯友兰原本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写中国哲学史,可是越到后来越向自己的“新理学”回归。虽然这部《新编》并不单是以他的“新理学”为归宗,而是以包括新心学在内的整个新哲学为终结,但事实上,这是曲折地表达了以他自己的“新理学”为归宗的愿望。因此,《新编》不同于《中国哲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哲学简史》,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的独具匠心,以及他的哲学家之“见”与哲学史家之“见”。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新编》是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兼哲学家的哲学史。

将冯友兰的“三史”依次说成是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哲学家的哲学史、哲学家兼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只是以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为标准对冯友兰的“三史”所作的一种阐释,虽然不排除这“三史”伴随着冯友兰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确实存在着一个不断提升和发展的过程,但我认为,这“三史”各有其特点,各有其价值。这“三史”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提供了三种写哲学史的范例,值得借鉴和效法。当然,诚如冯友兰所说的,“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不必拘于一格,事实也正是如此。不过,我们倒是需要学习冯友兰的重写中国哲学史的精神,写出我们自己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张荫麟. 评《中国哲学史》:上卷 [A].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31卷[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自序(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3]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4] 蔡仲德. 冯友兰研究:第一辑 [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 [5]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王华生]